论科普工作与司法审判的双向赋能

□ 杨德敏 田骥威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统筹协调，树立大科普理念，推动科普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提出，“要以高质量审判激励保护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凸显。”科普工作作为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培育理性精神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弥合社会认知鸿沟的重要使命。而司法审判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权威性与公信力不仅源自法律的刚性约束，更依赖于公众对司法逻辑的理解与认同。两者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在“培育社会理性”与“构建法治共识”的深层目标上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

一、科普工作在司法审判场域的功能实现

通过科普工作提升司法审判参与主体的科技认知水平。一方面，科普工作的开展可以使司法审判更好地面对科技迭代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例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潮流的到来，审判业务即将迎来系统性变革，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方式、司法理念等方面均要及时回应时代之需和人民期待。而科普工作的功用在于，通过揭示这些新兴技术的底层逻辑，可以有效判断其在司法审判中应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理解技术是应用技术的前提和基础。科普工作的开展可使法官、书记员等及时更新知识储备，加深理解新技术的基本原理、应用风险与法律边界，帮助其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准确识别问题、有效审查证据、精准适用法律、规范记录问题。而通过提升司法人员的科技认知，法院可以更好地将科技手段贯穿立案、审判、执行、诉讼服务的全流程，从

而减少人工操作的时空成本，提高案件办理的效率。

通过科普工作深化公众对司法审判的参与度。其一，接受科普知识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案件事实的认知能力。我国的司法审判活动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事实认定需依赖各类证据尤其是科学证据的运用，如生物样本鉴定、显微分析、电子数据模型等。对于公众而言，科普工作的开展可以加深公众对这类科学证据的认知，从而强化司法的透明度。其二，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结果的接受性与其自身的科学素质紧密相关。随着科技的发展，仅凭固有经验已难以实现对科学事实的认定。而公民科学素养则可以构成理解现代司法审判活动的解码器，从而矫正认知偏差，并建立起由技术可信度到司法信任度的传导路径。其三，消解“司法神秘化”倾向。司法审判具有极强的专业色彩，数字法院等新生事物的出现又在无形之间又构筑了新的认知屏障。科学技术普及及通过专业化、技术化的司法活动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参与的社会实践，能够让公众更为深入地了解司法活动的全过程。

通过科普工作维护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法治权威的重要方面，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其反映了司法审判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普遍尊重、认同与服从的状态。影响司法权威的因素是多样性的，法律程序的设置与遵守，司法审判活动的开放性程度，裁判内容的说理性，法官个人的职业素养，以及是否具备崇尚科学、客观理性的司法审判文化，均有可能影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信服度和认可度。对此，科普工作可以成为优化耦合机制。就社会公众而言，通过国家和社会的科普活动，可以培育自身的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提升对司法审判活动的认知力和判断力。而就人民法院和法官而言，则

可将科普内容融入司法审判活动，从而展示司法过程理性，实现裁判内容的通俗化阐释，并彰显司法过程中科技应用的公开透明性。这些都能够成为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环节。

二、司法审判为科普工作提供的功能支撑

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活动，因此科普活动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密不可分。例如，对某些技术领域专利内容的介绍和披露，需要遵循专利法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而对于直接复制他人的文章、图片、视频等研究成果作为科普活动材料的行为，则会涉及著作权保护的问题。科普信息的真实性及科普范围的限制性也会引致相关纠纷及侵权行为的发生。其中，科普活动中的内容创作、版权授权方面的合作可能涉及合同问题。对于普及及通过专业化、技术化的司法活动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参与的社会实践，能够让公众更为深入地了解司法活动的全过程。

通过科普工作维护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法治权威的重要方面，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其反映了司法审判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普遍尊重、认同与服从的状态。影响司法权威的因素是多样性的，法律程序的设置与遵守，司法审判活动的开放性程度，裁判内容的说理性，法官个人的职业素养，以及是否具备崇尚科学、客观理性的司法审判文化，均有可能影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信服度和认可度。对此，科普工作可以成为优化耦合机制。就社会公众而言，通过国家和社会的科普活动，可以培育自身的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提升对司法审判活动的认知力和判断力。而就人民法院和法官而言，则

科学技术普及的过程内在地蕴含了对科学技术相关原理与功用的解释，从而使公众能够接触、理解甚至应用这些知识和技术。但这一过程也存在科学知识被恶意曲解的可能。实践中，伪科学及虚假信息往往掺杂于各类平台和主流媒介，不仅对科普事业造成重大损害，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例如，以科学普及为幌子，兜售保健品骗取钱财，未经许可出版伪科学书籍；又如以科普为名煽动公众恐慌情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等行为均可触及犯罪底线。为了打击此类伪科普行为、营造良好的科学技术普及环境，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审判和惩处。

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浪潮既为人类社会带来了高效和便捷，同时也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渠道。人民法院站在与违法犯罪斗争的前沿，相比普通公众而言更能够掌握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违法犯罪动态，因此通过人民法院的警示教育普及教育，既能够实现普及特定科技知识的目的，也能够使更多的公众避免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通过普及毒品和医药知识从而使公众了解新型毒品的原理和危害，通过科普生物识别技术与AI技术使更多的公众免于网络诈骗等。

三、深化科普工作与司法审判双向赋能的路径

立足大科普战略，持续将科学技术普及融入司法审判过程。使每一个案件得到公平正确地处理固然是司法审判的不懈追求，然而通过司法审判过程的引导和示范，会更有利于揭开科学技术的神秘面纱，并指引社会公众的行为更加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为此，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如果涉及虚假科普信息及伪科学内容，人

民法院应当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并掌握关涉科学技术问题的实际情况。如相关案件影响范围较广，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及时回应社会公众对特定科技问题的关切，并在必要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在涉及科普争议案件，如科普侵权中，应更为重视专业技术人员就科学、技术、专业等问题发表的意见，并进一步规范对专家证据与专家意见的运用。在裁判环节，还可以尝试在司法裁判文书当中增加有关技术说明的内容或附件，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技术事实、消解技术壁垒。此外，要想充分发挥司法审判在科学普及中的保障作用，还有赖于健全的司法公开制度机制的建设，使公众便捷、有效地获取司法审判信息。

坚持系统思维，实现科学技术普及与法律普及相结合。司法审判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既是生动的法治课，同时也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普及，能够将培育公民科学素养与法治素养有机结合。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迭代发展往往带来法律上的挑战。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权利和个人信息保护成为法律工作的重要议题。而基因编辑、脑机交互等技术的发展也不断挑战着传统的法律底线和伦理价值。因此，科普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公众接触科技知识提供便利，还在于通过具体的科技发展案例，明晰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公众理解科技创新与法律的关系，而司法审判活动正是使社会公众了解科技法律风险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人民法院面对科普工作，既要保持积极，也要注重谨慎。这意味着人民法院既需要拥抱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工作效率，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的支持和引导，也需要坚持使科普活动与自身职能定位和工作特点相结合，在合理合法的限度内开

展科普工作。此外，人民法院还可以积极拓展网络普法渠道，利用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普及有关科技发展的法律知识，解读相关案例，推动全民形成有关科技创新的正确认识。

坚持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司法审判工作队伍的科学素养。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法院应当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法律实践的革命性影响，并将提升科学素养视为其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和战略投资，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这就要求司法审判工作队伍不仅要法律专业能力过硬，还要积极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新格局，从而更加善于运用法治力量助力科普工作的开展。为此，应定期组织司法人员参加与科技相关的培训班、研讨会和讲座，邀请科学技术人员讲解相关原理，帮助司法人员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尤其是与司法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同时，可将通识性、基础性科学技术课程纳入司法培训体系，使碎片化科技知识转向系统化集成。此外，还可探索建立“法律+科技”应用复合型人才库，逐步加大理工科和法科复合型专业审判人员选拔力度，从而更好地处理技术密集型案件。

【本文系江西省管理科学项目《修订我省科学技术普及及地方性法规研究》(20232BAA1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正与效率论坛

责任编辑 唐亚南
见习编辑 武凡熙
电子邮箱 llb@rmfyb.cn
llzk@rmfyb.cn

网络圈层拼团诈骗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难与路径

□ 李卫琳

法治视点

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网络购物的兴盛，消费者购物需求的延伸不断拓展着电商平台的发展空间，催生了新兴的商业模式——消费者到企业模式。消费者到企业模式是继企业到企业模式、企业到消费者模式、消费者到消费者模式之后的一种新型的电子商务模式，其核心在于消费者需求产生先于供应方生产，供应方在满足消费者提出的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定制化、面向特定对象的商品生产。网络圈层拼团即是消费者到企业模式的一种类型，主要表现为由一名或几名网络圈层成员作为消费者代表，并在该圈层召集其他成员共同筹集资金，从而购买、获得某种符合网络圈层成员爱好的特定的商品，被消费者习称为“拼团”。该类模式在网络圈层生态下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习惯。

然而，其中涌现出许多失范现象，更有甚者利用该商业模式实施诈骗行为，涉案金额上千万，已经涉嫌构成犯罪，但仅有极少部分消费者向交易平台追回补偿，大多数受害者维权失败，还有部分受害者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大多未得到有效回应。究其原因，是由于该商业模式在表面上形似普通的民事纠纷，仅涉案金额达到追究标准，

但涉案人数众多、个体消费者损失金额局限，加之交易习惯中存在较多消费者让渡自身权利的内容，致使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难，缺乏对其进行刑事追责的外观，从而导致实施此类行为获益巨大而风险极低，形成滋生违法犯罪的真空地带。

一、网络圈层拼团诈骗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难

第一，圈层身份认同使消费者群体让渡自身权利。传统交易中，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仅限于交易行为中的买卖双方，二者地位相对平等，在履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程序更加严格，法律手续更加完备。而网络圈层的社交属性使交易中的双方关系异化，“圈层身份认同”跃居上述维持消费秩序的客观有效因素之上，成为主导因素。圈层成员优先将消费者代表视为圈层中的核心成员，而非与自己成立交易关系的民事主体，由此自动放弃了部分消费者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在圈层内的身份定位，也因此导致了交易约定内容的宽松，表现为容忍交易习惯中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规则。尤其是在履约时间方面，消费者对履约期限具有超过其余消费模式的高度包容性，从而为消费者代表拖延履约乃至逃避履约提供了可依托的交易习惯背景，也使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缺乏了履约时间的重要参照。

第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表征模糊。目前已有的对“非法占有

目的”的认定主要从资金用途、资金流向、是否存在逃匿情况等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该种商业模式中的商家承担风险能力有限，为控制生产成本、避免商品积压，商家普遍采用先接收消费者需求、收取部分货款或全部货款作为定金、后进行商品生产的模式，牺牲商品售卖的即时性以换取商品出售率。一个商家有时需要在同一个时期同时进行多项商品定制，存在订单排期。在商家无法保证自身产能、回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的商品需要在漫长的等待周期后才能开始进入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交易中多项关键节点需要向每一名消费者确认，如定制产品“打样”，即在大规模生产前，先制作少量的样品，以确认设计、材质、颜色、工艺等是否符合预期效果，若有修改内容，再由商家生产新的样品，有的消费者代表会进行一次打样，有的则会进行两次甚至更多，过程的繁多必然使交易时间延长。进而此类交易行为通常并不会规定非常严格的履约期限。因此，消费者代表“沉默”地长时间持有消费者的财物具有合理性，在常见的交易中被视为主动逃避履行或消极履行义务的行为在该商业模式中却不易被判定，更无从根据客观表征推断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网络圈层拼团诈骗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

在传统经济犯罪中，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的证明本身就

存在着困难，对行为人的“占有”“目的”“动机”“明知”等心理活动的事实难以直接证据确定，需要依赖于基于客观事实的“推定”。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实际上正是利用客观事实对主观要件的推定进行认定。在不同类型类型的诈骗犯罪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事实表现具有不同规定，但总体上是将行为人的偿还能力、取得被害人信任的方式、事后的逃匿与销赃行为等事实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对该商业模式下违约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可以参考刑法与司法解释对诈骗犯罪的规定，考察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对约定的履行情况以及是否具有逃匿、隐匿等情况。

第一，考察约定时的履行能力以及是否具有有效担保。消费者代表的义务主要为联系或监督商家生产商品，对消费者群体的不同需求、资金进行统筹，以及分发商品等，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对履行能力要求不高，主要需要考察消费者代表的空闲时间、责任能力、可信任程度以及“开团”经验，具有一定对经济条件的要求，但相对较低。基于上述需求，部分网络圈层中自发出现了消费者代表的“准入条件”，即某位圈层成员若想要成为

消费者代表，需要经过向网络圈层所属成名文创作品的官方报备，如《光与夜之恋》官方针对同人二创的非盈利自印行为，通过“二创许可规定”（《光与夜之恋》二创许可范畴的规定）明确了行为规范和报备流程，以规制同人二创行为；或是公开“自证”自己在成名文创作品中的消费、过去“开团”经历的过程，以证明自己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尽管对消费者代表的“准入条件”尚未推广到该商业模式的全部交易行为中，但已有的“准入条件”可作为对行为人履行义务能力的考察参考。即时间、统筹条件——行为人的身份、职业是否能够履行义务提供足够的时间；行为人的年龄、经历是否使其具有一定的统筹协调能力。社交身份条件——行为人是否属于网络圈层的成员，是否具有“核心成员”的身份，或对成名文创作品有足够经济投入的可信度。经济条件——这一条件的优先级次于前二者，但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即行为是否具有欠债、无固定收入、失信等情况。

第二，考察合同签订后履行义务的情况。即消费者代表是否按照约定积极实施代表消费者群体与商家沟通、监督并通知商品制作进度、核对商品质量、商品发货、售后等行为，以及是否主动同步商品的行为动向，并在期间解答消费者群体关于交易的疑问，是否具有逃匿、隐匿、不当使用等情况。消费者代表在筹集资金后退出群聊、失去联

系，其开设的用于收集资金的平台店铺中的余额全部提现，资金无法通过平台介入返还，消费者群体无从寻求维权渠道。不当使用即已将筹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导致资金无法退还，同时又尚未逃匿、隐匿，在消费者群体中维持自己仍在履行义务的假象的。还存在更具有模糊性的中间地带，即并未对资金挪作他用，只是保持对资金的持有状态，同时不履行义务。

综上所述，对该种商业模式下违约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当参照司法实践的做法。在消费者群体提出质疑、发现消费者代表具有实施犯罪的外观时，侦查机关应启动对消费者代表动向、资金去向的侦查。若查证消费者代表改变资金用途、导致资金无法返还，或逃匿、隐匿、拒绝退还资金，同时又无法提出反证证明证据的，应当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而若是仅有保持对资金的持有、不履行义务、同时又未逃匿或是将资金挪作其他不当用途的，由于其尚未中断与消费者群体的联系，又具有偿还能力，则不能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而应督促其积极履行义务或返还资金，若经提醒后仍然未能履行、也不退还资金，则应当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网络毒品犯罪形态认定研究”(GFZDKT2024C02-1)】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